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现状 原因与对策

○ 王建华

(厦门大学 高教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是大学中介组织的原生形态, 是人们为了协调大学与政府间的矛盾而做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已趋于成熟, 但在我国, 由于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的局限, 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一直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以现状、原因、对策为主线, 对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进行了系统研究。

[关键词] 中介性组织; 大学与政府间; 现状;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72(2002)03—0001—06

Present Situation,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WANG Jian-hua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is the primary form of butter organiz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engaged in harmoni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t the present, It is coming into maturity in the many other countries, but in China, hasn't been made any progress virtually resulted from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its study on it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present situation; cause, countermeasure

—

过去, 我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 再加之, 人们较少从中介的视角来看问题, 来考虑大学与政府间的关系。于是, 很多人会认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不存在中介性组织。事实上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因为, 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那些起实质作用的、协调大学与政府间矛盾的中介性组织要以市场经济为背景, 而有些中介性组织是不受经济体制制约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有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 其主要表现为一些协会、学会等。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政府职能的转变, 以及相应的法律政策的出台, 大学与政府间的一些更具实质意义的中介性组织, 比如评估中介组织, 开始发展起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概况如下: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概况表

类别	名称及成立时间
协会类	全国教育工会(1979), 中国高教学会(1983),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1984), 全国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1985), 中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1985), 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1986),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1987),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1989), 产学研合作教育协会(1993), 中国高等学校评估研究会(1994)等

[收稿日期] 2002—08—26

[作者简介] 王建华(1977—), 男, 河南息县人, 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类别	名称及成立时间
就业中介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广东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等
研究中介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198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9), 国家教委教育信息管理中心(1989), 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1989)等
评估中介	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1992), 广东省学位委员会(1993), 上海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1996)(现为上海教育评估院),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1997), 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辽家省教育评估事务所(?), 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2000), 北京高等学校质量评议中心(1993), 广东省高校教育、教学评估委员会(?),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等
校长会议	粤西地区高校校长联席会议(?)
董事会	1987 年, 汕头大学组建了我国第 一个高校董事会, 目前, 设有董事会的高校已达 100 多所
基金会	霍英东基金会(?), 何梁、何立基金会(1994)等
校友会	普遍存在于各 个大学

注: 各类学科评定委员会也属于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另外, 也曾有学者对在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作过理论探讨, 并且广东省也曾设想成立大学与政府间的拨款性中介机构, 但最终没有实现。

通过上表资料, 可以对我国目前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这些中介组织中, 协会类最多(实际上可能远比以上列举的还要多)。因为这类中介性组织, 没什么权力, 活动范围有限,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力, 政府较少加以限制。另外也要注意, 这些协会类的中介性团体多是出现在 1989 年或 1989 年以前, 1989 年以后成立的较少。这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 国务院曾发出通知, 对于社会团体要严加整顿, 并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社团组织。另外, 校董会的数量也很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大学的董事会多是有名无实, 谈不上协调大学与政府间的矛盾, 就连筹集部分办学资金的功能也很难完成。其它的基金会、就业指导中心、研究中介等相对较少, 而拨款中介根本就没有,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最近几年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比较可喜的是, 近年来我国的评估性中介机构发展较快, 虽然其中的具体运作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但毕竟人们已经有了这种意识, 并付诸实践, 事情总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上面从总的方面对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现状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 我们可以再选择一个案例来具体分析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实际运作状况。下面是一份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的工作职责和机构设置简介: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工作职能、机构设置简介

一、工作职责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直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具有对本市各类教育进行评估的资格, 是专职从事本市教育评估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

1. 接受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委托, 开展对各级各类学校(包括民办学校和国际合作办学学校)设置、办学水平、专项等评估, 提供有关鉴定意见和评估报告。
2. 接受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实体的委托, 诊断学校办学质量, 提供相应的评审报告和研究咨询报告。
3. 开发并建立教育质量监控网络, 追踪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走势, 定期或不定期地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教育质量咨询报告。
4. 接受各单位委托, 制作各类教育评估方案、指标与标准, 设计相应的评估方法与技术, 制作相应的计算机软件, 提供教育技术与咨询服务。
5. 接受各部门、单位委托, 开展社会性教育评估服务。
6. 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个人委托, 开展教师职务、学术水平、能力评价和学历、教学能力见证等工作。
7. 开展教育评估的理论研究与评估学术交流活动, 加强教育评估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

8. 开展各种教育评估的专题培训,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培训评估人员。

9. 承担与提高教育质量相关的其他业务。

二、内部机构设置

目前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机构设置如下:

院办公室、研究室、高等教育评估室、普通教育评估室、人员测评部、普通话测试部、咨询服务部。

在上述文献资料之外,笔者还了解到,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的前身是 1996 年 4 月 22 日成立的上海市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当时成立评估事务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精简机构、人员分流”的需要。刚开始事务所实行自筹自支,但发现不行,无法生存。最后改成了现在的全额拨款。1999 年在原评估事务所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目前,上海市教育评估已正式挂牌。据评估院院长洪桐成教授介绍,目前评估院的业务来源主要有两项,第一项也是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其次是对社会上一些学校进行有偿评估,业务不多。评估院在具体评估的过程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具体评估及相关的指标设计都要聘请外面的专家。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下面可以再看一份香港学术评审局的资料。它们同为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差别到底在哪里。

香港学术评审局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香港学术评审局由 22 人组成。由特区行政长官委任。成员分三类:海外学术界人士,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学术界人士以及香港工商界人士。每类 5—7 人。评审局工作职责如下:

1. 就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学术评审,在两个方面提出独立、权威的意见。一是鉴定或重新鉴定院校所开的学位课程;二是检查高校的一般学术水平。
2. 确认一所高校是否有能力在评审局做定期检查的基础上,就其学位课程进行自我评估。
3. 与其他国家的评审机构建立关系及保持关系,并经常研讨评审局及海外其它评审机构的学术评审制度。
4. 收集、传播有关学术评估的方法和程序方面的先进资料。
5. 收集、传播有关学位课程和资历水平的资料,并就此提供意见。
6. 举办研讨会、会议或其他形式的推广活动以及协助维持监察学术水平。
7. 推广学术评审和教育质量保障经验。
8. 就学术评审及资历水平事项向特区政府提交意见。
9. 向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注册处处长就课程是否适合注册事宜提供意见。
10. 执行由香港特首准许或指派给学术评审局的与学术评审有关的其他职能。

通过以上两份文字资料的比较,结合平日的思考,我认为我国大陆目前以评估性中介组织为代表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机构未获得充分的合法性^①。这其中社会合法性及法律合法性的缺失尤为严重,使得一些机构工作的展开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即便其勉强具有的行政合法性也多是以牺牲自主权为代价换来的,可谓得不偿失。

其二,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没有“中介性”,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中介。这其中较为正规的评估中介也只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业务委托单位”或称之为“技术咨询单位”,其他形式的学会、协会、委员会更只是徒有虚名,根本不具有缓冲大学与政府间矛盾的资格。

其三,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提供的服务层次比较低。比如评估中介,大致就是做一些学校的合格评估什么的,缺乏高水平的学术评估。事实上,也缺乏从事高水平学术评估的能力。

其四,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的行政色彩较浓,与教育行政部门存在着直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这是最致命的弱点,但又是现阶段必然存在的。

^① 从理论上讲,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学自主权比较缺乏的国家,大学中介性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应该容易获得。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思维与实践习惯的影响,再加之政府权力下放的缓慢,大学中介性组织却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合法性。这种矛盾性我认为可能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要面临的诸多“悖论”之一。

其五, 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类别过于单一, 一些相当重要的中介性组织, 比如拨款中介难以出现。

上面就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现状, 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但事物总是两面的。我们进行价值判断也一样。若从另一方面看, 我国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能在短时间内具有这样规模, 总是可喜的。古语有云“物之初生, 其形必丑”,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超越它自身存在的历史阶段, 以及它周边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 随着社会各方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一定会逐步地走向规范, 成为大学与政府间名副其实的“缓冲器”。

二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 其根在西方。换言之, 在我国, 大学与政府间缺乏“中介”的传统。在我国的历史上,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始终是国家的事业, 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控制更是等同于对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清末, 由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出现, 西方的大学制度开始传入我国,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可变更性, 这种大学制度也无法改变我国既有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集权管理。再加之, 当时民族灾难深重, 高等教育更是成为救国的“利器”, 绝无“独立”的道理。建国以后,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大学成为国家的一个事业单位, 彻底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事实上,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 我国社会长期一体化, 一切社会活动都高度的政治化, 意识形态主导着人们的所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一切“中介”的东西更是无处藏身。因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们信仰的是直接的英明领导、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经济发展(或说是发展经济)的需要, 一批市场中介机构开始建立, 并在经济发展中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社会中介机构的巨大作用开始显现, 它沟通政府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同样是在 90 年代, 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僵化的弊端全面暴露,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一些专家学者^① 开始从中介组织在国外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的成功应用中受到启发, 开始思考中介性组织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并纷纷撰文提议在我国构建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已很多, 实践进展也不少, 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问题是存在的, 原因是复杂的。因为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的构建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关,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理得清。故此, 下面只能针对上文指出的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现状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做几点浅显的原因分析。

原因之一: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机构的合法化问题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中介机构合法性的实现有很多途径: 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等等。但是我国的现实是: 政治的必须无条件服从, 法律的严重滞后, 社会的则不愿给予。具体而言,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我国的中介机构无论是官方、半官方或者民间的其首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 我国的中介机构是“只有遵守才有可能成立”, 而不像国外的, 只要遵守了就具备了合法性、就一定能成立。另一点, 我国在中介组织或称非营利组织立法方面, 严重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具体到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也就是说中介机构通过依法成立, 从而获得法律合法性的可能性不存在。第三点, 社会合法性的拒绝给予主要体现在文化传统上, 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的, 尤其是在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上, 文化传统里缺乏中介的因子。同时, 再加之中央权力的过大, 占据着所有资源。因此, 社会对于中介机构的合法性很难认同(因为它不占有资源, 也不具有支配资源的权力), 认为它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仆人”、“佣人”, 很难把它当成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看待。事实上它也真的不是。那么, 在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何以有资格存在呢? 这里就涉及到行政合法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很重人情面子的国家, 一个机构的成立总要邀请上一级的领导出席讲话, 参加活动、担当顾问等等。从而经由“爱屋及乌”的原则, 这些中介组织便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综上所述, 由于在四种合法性途径中, 只有行政的合法性得到了顺利的实现。所以, 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机构因合法性不足, 而经常出现“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就在所难免。

^①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张德祥、邬大光教授于 1995 年 8 月 23 日首先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高教管理与中介组织》, 此文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界首次将中介组织的概念引入高等教育管理之中, 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从 1995 年至今, 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以中介组织为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已不下百篇。

原因之二：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机构的形式化在我国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肯放权，中介机构没有支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也就没有权威可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再加之，当初有些中介机构的成立本身就是出于精简机构的需要，在上级部门眼里，其本来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站”，又如何能免于形式化呢？最后一点，就那些中介机构自身来考察，在现有的情况下，即便给它大的任务，它能完成吗？所以，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的形式化，是我国转轨时期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当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后，当这些中介组织有了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可供支配的资源以后，当它充分地获得了合法性，具备了一定的权威后，形式化将会自动消失，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中性组织。

原因之三：我国现有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除了“形式化”外，不可否认也具备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业务。现有的中性组织中，业务最多的当属那些评估性中介组织。但从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的工作职责来看，其所从事的还只是一些低层次的工作。这种工作并不足以体现其中性组织的本质。因为评估中介，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协调大学与政府间的矛盾。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评估中介还很少有涉及到学术评估。这就不可能起到维护大学自主权，协调大学与政府间矛盾的作用。当然，也可能是现阶段我国大学的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大学与政府间根本就不会因为学术问题而发生矛盾，评估中介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可做。但直觉告诉我们，事实绝非如此，若果真如此，评估中介也就失去了精华所在，其存在的意义都值得怀疑。

原因之四：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性组织的独立性也是一个过渡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单是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其他领域也一样。比如在我国，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属于财政部，律师事务所属于司法部等。这种情况的出现起因于我国对社团管理的“双重体制”。所谓双重管理体制，即一个社会团体或是中介组织要受到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也即上级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所以，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与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情况的结束只能寄希望于社团管理条例的修订，寄希望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取消。另外，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性组织的单一，也是一个发展阶段问题。具体来说，我国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例如，拨款中介的没有出现，这主要是由我国特有国情决定的，因为钱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对于集权的政府来讲无疑是最难以割舍的。

上述分析也许不够全面，但却足以说明问题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事实上，造成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性组织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很多，方方面面交织成一个复合体，难以条分缕析。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性组织面临的问题还有着普遍性。大学中性组织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市场中介机构中也一样存在。比如有些专家指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从部门管理转制为行业管理的行业协会（本质上应是社会中介组织，笔者注），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政府部门的分流人员。行业协会多偏重为政府机构服务；有的行业协会甚至是‘二政府’，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问题和要求，他们认为‘自下而上’应该成为行业协会产生和发展的主流。目前，成立行业协会必须找有关部门挂靠的规定应该改革。因为这样直接导致行业协会与政府不分，无法自主开展活动，甚至个别协会假借政府的名义，干一些违规乃至违法的事。‘民间化’应该成为行业协会的主流。”

三

上面分两部分谈了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性组织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接下来一定要谈一谈对策、建议。但要指出的，也可以说是反复强调的是，由于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的构建刚刚起步，问题看似很多，但也许还有一些更本质的问题尚未暴露，本文指出的一些问题也只是个人看法，很可能“一叶障目”、挂一漏万。所以，在原因分析中，笔者强调所谓原因只是对本文指出的几个问题的原因分析。因为若笼统地讲对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性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很可能会不着边际。基于同样的理由，接下来的对策建议也只能是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就个人的理解，借鉴国外的做法，针对在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性组织的问题提一些个人的思考。

其一，政府的责任。政府是现代社会的主导者，在现代社会的各类组织中，政府组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政府更是倾向于无所不管,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喜欢负有无限的责任。在我国,由于政府手中握有足够的资源,其允诺与否就成为大学中介性组织能否得以存在的关键。目前,在多方努力下,我国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已开始上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政府应首先立法或通过修订有关法律,比如税法、银行法、捐赠法等,以利于中介组织合法性的获得与长远发展。其次,应进一步深化政治制度改革。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远远地走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头,政府职能转变与否以及转变的程度如何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一个瓶颈。中介组织作为替代政府职能的一种有益补充,更是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样一方面中介组织可以“有活可干”,另一方面也可能摆脱双重管理体制的羁绊,从而走向“民间化”,具备真正的中介性、独立性。

其二,大学的责任。大学作为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被保护者,其自主权的有无,是中介性组织得以产生的关键。理论上大学中介性组织是因为大学自主权有受损的威胁而产生。而我国的实践则似乎与之无关,很少有人会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大学中介性组织的产生联系起来。因为大学的自主权甚少,中介性组织也主要不是保护大学的自主权,因为大学的自主权尚处于从无到有的漫漫过程之中,又谈何保护。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也值得保护、需要保护。不过笔者怀疑,可以是可以,不知如何保护得了。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大学的责任在于从精神上重树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信仰(当然这是在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否则一切都等于零)。当大学与政府发生矛盾时,大学应相信自己是对的。在知识与权力的博弈中要主动出击,通过自己的代言人(中介性组织)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借此增加自己在这场“交易”中的议价能力,而不应事事沦为政府的应声虫、行政权力的奴隶。不可否认,这样的建议可能过于理想;但同样不可否认,不向这个方向努力,大学的中介性组织将永远只是一个“摆设”。因为,大学若没有从本质上产生对中介性组织的需要,政府又怎么可能支持它;而政府若不支持它,大学就更不需要它。所以说,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必须是双方博弈后的产物。我们的情况是,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并没有经过这种博弈过程,而是直接得出了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就只能是名不副实。而今,亡羊补牢的办法就是大学站出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

其三,中介组织自身的责任。现有的中介机构在制度建设上还很欠缺,同时也缺乏有魄力的领导者。我们知道,希望工程的发起者,中国青基会是我国目前运作最为成功的一个大型社会中介组织,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它有着规范的制度和卓越的领导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社会生活中合法的统治分为三类,即法理型、传统型和魄力型。他的这种分类也就意味着一个组织机构能否正常运作,要么取决于法定的权力,要么来源于传统的惯性,要么是因为其领导者的魄力。联系到我国大学中介性组织的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找出路。第一,参照国外典型中介组织的做法,进一步完备自身在机构设置、运作方式、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工作;第二,在没有国家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吸引各方人士成立董事会,然后经由董事会章程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约束;第三,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领导者的素质。作为大学中介组织的领导者,除了一定要有魄力、有奉献精神外,还应有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信仰。

其四,理论工作者的责任。目前我国对大学中介性组织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不能说很深入。尤其对于一些课题,特别是极有政策意义的课题往往浅尝辄止,很是可惜。比如前些年,对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制的研究、对高校董事会制度的探讨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诚然,学者的研究能否为政府采纳不是学者能决定的,但仅就研究而言,深入的探讨绝对是必要的。因为浮光掠影的东西是不足作为政策的理论根据的。所以,笔者以为,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即便这种研究的成果不能在短期内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用,我们也要保持有研究的热情。作为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相对地走在实践前头是必须的。

上面从四个方面,即政府、大学、中介组织自身、理论工作者四个维度对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如何走向完善,谈了一些看法。在这几个因素里,政府是主导者,政府不松口,一切的努力都是白搭。在政府允诺的前提下,大学的需要是关键。因为大学若没有保护自己自主权的意识,中介性组织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要么就是干一些出力不讨好的琐事。在以上两个因素具备之后,中介机构自身在研究者理论成果指导下,通过实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在社会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也至关重要。当然,政府也可能在大学的压力下采纳学者的建议。总之,只有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才能促进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逐步走向规范,才能真正起到调节大学与政府间矛盾的缓冲作用,也才算完成大学中介性组织的真正使命。